

台灣與香港，兩個似乎截然不同的社會，細究起來，其實有著極類似的歷史發展。台灣在結束日本殖民統治後，在接續而來的中國政權統治下，由於文化與政經矛盾，逐漸發展出台灣人意識（雖然一直到二十世紀晚期，自認是台灣人的比例才成為多數，但早期的省籍矛盾，早已隱含台灣人意識的形成），並在多年的努力後，取得民主自由的成果（雖然仍有待鞏固加強）。

香港則是1997年回歸後，面對中國政府步步加強控制的意圖，以及陸客與中國資本入侵，也開始有香港本土意識的出現，所謂「戀植」現象，就是一個徵兆。並在21世紀初開始政治化，爭取政治權利。

然而華語世界最為活潑多元的社會，卻在邁入21世紀時，共同面對兩大相同的挑戰。如何妥善因應，將是台灣與香港能否繼續邁向民主、自由、公義的關鍵。

中國因素

依賴民族主義以維繫政權存在的中國，緊緊拉住台灣與香港，是其重要工作。對台灣，從1996年的兩枚飛彈到2012年大企業主力挺92共識，影響大選的意圖昭然若揭。手法越來越細膩，就12年來看，也有一定效果。除了選舉，更透過讓利、採購、參訪、各種統戰論壇，企圖全面滲透社會各面相。

更令人心驚的是旺中案，試圖藉由掌握資訊，控制思想。對香港，除了利用選制，控制特首及立法會選舉。洗腦工作更是絕不放鬆。國民教育雖然暫時被擋下，但洗腦仍然無所不在。

新自由主義對社會正義的侵襲

80年代，台灣社會運動蓬勃一時，各種社會力百家爭鳴。其後因主戰場移往政治，而稍稍沈寂。然而近來，社運又再度層出不窮。大埔事件、華光社區事件、樂生療養院事件、關廠工人抗爭 [究其實，都是在新自由主義的思維下，追求商品化、利益最大化。土地與房屋不再是安身立命的場所，而是追求最大利益的工具商品，人民居房權讓位給以更新、公共利益為幌子的建商利益。工人只是可輕易取代的勞動力，一旦不能為資本家創造更大利潤，馬上棄之如敝屣。甚至創造出人力派遣、自然人承攬等非典型勞動型態。

而原本應維護公義，促進財富分配的政府，本身就是這波新自由主義的帶頭者。

香港的情形有過之而無不及，少數幾家地產霸權，非僅掌握地產，幾乎所有香港人的食衣住行，莫不再他們掌握之中。

再加上前文所述，中資大舉侵入，造成社會分配惡化，香港人日益貧窮化。

中國因素與新自由主義正嚴重威脅台灣與香港的民主自由及社會基礎。而政府卻扮演推波助瀾、助紂為虐的角色。前景似乎黯沉，但我們仍看見一線曙光。

希望-公民力量的展現

香港國民教育風波，港人展現團結的力量，學生、教師、小市民，合力迫使港府暫停實施。碼頭工人罷工事件，更在各界支援下，逼使大財團低頭讓步。

而在台灣，雖然除了旺中案有暫時的戰果外，其他抗爭事件都稱不上勝利。

但過程中，我們看到學生、學者、文化人士、小市民為了與自己利益無關的事件勇敢站出。台港兩地，表現出相當成熟的

公民社會力量。公民對不義的憤怒與挺身而出，將是希望所在。

然而，這波公民運動，顯然與政治運動切割。而政治團體也只能作壁上觀。

在追求公義社會的路上，政治團體與公民運動者彼此互動的戰略為何？二十年前，新潮流曾提出「社運政治化，政運社會化」。現下，當然無法用這麼簡單的口號，來處理雙方的戰略關係。然而，公民社會終究無法與政治永遠切割。未來，雙方如何互動合作，有賴學界及運動參與者共同摸索、發展。

作者周威佑為台北市議員